

# 陕甘宁边区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实施及成效(上)

工农通讯员制度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加强工农群众的联系,同时弥补党报党刊宣传在群众中影响有限之不足,借鉴苏联的工农通讯员运动经验而建立的。工农通讯员通常是从工农中挑选的具有一定知识和文化水平、能撰写稿件的人,或由从事宣传工作及与工农工作相关的人担任。通讯的内容涉及工农群众自身的生活情况、工作条件、家庭状况、对时事的感受、对政治问题的认识等方面。

抗日战争时期,党延续和发展了这一制度,在陕甘宁边区采取工农通讯员写稿等形式,鼓励群众成为党报通讯员,通过写稿和投稿来反映自身诉求或身边的革命实践。关于工农通讯员制度,当前已有一些研究,但有关其宣传与组织功能的一些复杂问题仍需厘清。例如,党出于何种现实原因而动员群众参加办报?动员路径中又曾存在何种偏向,后续又如何调整政策?

基于此,本文拟结合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分析党为何以及如何开展工农通讯员相关工作,从而促使群众从“向我宣传”转变为“我要宣传”,进而在思想觉悟上从“要我革命”提高至“我要革命”。

## 一、抗战新形势与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实施

为了实现革命的目标,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将群众动员起来,聚合并释放革命力量。如何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列宁认为,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能够教育读者密切关注政治,思考其中的意义以及影响。由此,工农通讯员制度在苏联得以建立并不断发展完善,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实施的工农通讯员制度参考了苏联的做法,但基于中国的革命形势和具体实际,并借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成功经验,逐渐形成了自身特色。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面对生存和革命的紧迫形势,组织发展、制度建设等成为根据地政权的重要工作。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党的新闻工作以完善宣传部门的组织架构为主,并注重报纸在群众中的推广与发行,工农通讯员相关工作尚未大范围开展。

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以及革命在乡村社会的深入推进,中国共产党开始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调整新闻宣传工作路线,逐步加强与群众的联系,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毛泽东强调,做政治动员和宣传工作不是将政治纲领灌输给老百姓听,要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

以这一时期的《解放日报》为例,报纸共四个版面,第一版是国际新闻、国内新闻和社论,第二版全部是国际新闻,第三版是国内新闻,第四版是边区和副刊。1942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要求《解放日报》必须贯彻党的路线与政策,将贴近群众作为办报的基本方针。这对根据地新闻

工作者而言并非易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在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指出,党的文艺工作者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和工农兵大众打成一片,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要是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要为群众服务。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他还指出,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

在文艺和宣传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指导下,延安《解放日报》完成了改版,加强了对群众生产生活和革命斗争实践的反映和报道。这项工作的开展,既需要报社的积极作为,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

随着战事的深入,日军开始抽调兵力,将抗日根据地作为主要的进攻对象。习惯于宁静生活的乡村农民,面对战争压力所带来的生存威胁,一时难免不知所措,需要提高斗争意识和应对技能。有时,为了躲避空袭,“老百姓一个一个地走出城来,赶着他们心爱的毛驴,背着包裹,扶老携幼地下乡躲飞机”,“号子一响或偶有一个人跑,别的人就跟着乱跑。他们还听不懂警报的信号,而他们是吓坏了,一切声音对他们都有极可怕的意义”。

此外,日军也加强奴化教育,试图摧毁中国军民的反抗意志。在日伪占领区,他们以妥协思想和投降言论混淆视听,宣称“无论在敌后怎样活跃,也不能挽救抗战危机”,甚至将人民武装污蔑为“造反”,进而以诡辩的方式来否定人民战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些都给党的宣传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挑战。

面对抗日战争特别是舆论斗争的新形势,中共中央指示,宣传部门应在新闻领域积极开展斗争,揭露谣言。根据地的报纸

成为承载这一任务的主体,需要向群众介绍时局发展、解释党的政策。在陕甘宁边区选举期间,党报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向群众解释选举工作,刊登模范事例以及相关歌谣。农民感受到“干部是群众的伙计”,选举投票得以顺利进行。但是,传播内容的通俗化并不代表革命意识的大众化。观念的传播并不是从一个端点传递到另一个端点的线性过程,受众在思维和行动上的能动性同样值得重视。根据地各级党组织的宣传动员手段,还需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如何做好宣传动员工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要把群众动员起来,参与宣传工作。自1943年起,中国共产党开始调整根据地的新闻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实行的工农通讯员制度得到延续和发展。对于边区群众而言,如果宣传者与自身具有相似性,更易在情感上形成认同,也更容易接受后续传递的政策纲领等内容。

譬如,赤水的工农通讯员曾撰写新闻报道,叙述了一个普通农民如何组织农会、发动减租斗争,并成为群众领袖的过程。《解放日报》对此给出了积极评价:文章中,作者列举5天翻地1300亩的数据,彰显劳动者力量。可以说是描写了一个坚持抗战、热爱边区的革命农民形象。

工农通讯员的稿件将革命战争与乡村生活相统一,传达了一种信号:即便资源匮乏、生存艰难,中国共产党人依然在坚持带领人民反抗侵略,群众依然在坚持生产。中国人民没有屈服于敌人的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根据地的斗争意志绝不会动摇。

事实证明,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实施,大大增进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普通民众中的传播度,同时也极大地密切了党同群众的联系,促进了边区宣传动员工作的开展,收到了良好效果。(未完待续)

(据《党的文献》)

## 清朝及近代畜牧业

清朝政权起于东北,以游牧兴国。入关之后,关外草原仍是其稳定的畜牧业生产基地。“牧马惟口外最善,水草肥美,不糜餲而孳生甚多”,“岁之繁衍孳息者以千万计”,足够调用,内地养马,已无关紧要。清朝贵族以武力统一全国,建立了空前强大的清王朝以后,开始在统一的政令下,按划定的区域,分地经营不得逾越。随着军事对抗和大规模用兵的结束,国家对军马的客观需求相对减少,内地监牧已失去存在的必要。康熙二年(1663年),议裁甘肃苑马寺及开城7监,牧地“划归附近州县纳粮”,官营养马业亦废。

### 养马业的凋敝

满人入关,建立清朝政权。执政之始,为了削弱国内各族人民的抗清力量,对百姓养马严加禁止。顺治五年(1648年),清廷下令,“现任文武官及兵丁准其养马,其余人等不许养马”,并不许百姓“沿途买卖”“互市”马匹。顺治十五年,对“民间乘马,永行停止。违者,责四十板,马入官”。康熙执政前期,多次发布命令,“禁民间养马”,同时还规定,一旦发现私养马匹,不仅马主要按律重处,对“失察之该管官罚俸一年”。从此之后,民间养马遂被禁绝。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虽然禁令解除,“民人养马,无庸察禁”,但至雍正时,又一度“不许(民间)牧养驽马”,百姓怕违禁,不敢养马,六盘山境域内养马业彻底破产。

顺治初,清兵占据关陕后,接管明代监牧故地,沿袭明制之旧,“设洮岷、河州、西宁、庄浪、甘州五茶马司及开城、安定、广宁、黑水、清平、万安、武安七监,岁遣御史一人经理”马政。其时,清兵忙于镇压反清斗争,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官营畜牧业勉强维持。

清朝关外马场牧马虽多,但要调往各地,需费时日。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康熙谕令驻守战略要地的满兵“拴养马强”。固原、甘州、陇西兵各拴马1000匹、驴100只,以备紧急时调用。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又调骆驼5000峰,令巡抚琦奇派派官兵并兵丁,在察罕托灰水草佳处放牧,军用马厂随之建立。乾隆十六年(1751年),罢减任固原提督时,整顿放牧秩序,按营划地,设置马厂。提标中营参将马厂在今西吉县沙沟乡至彭堡乡之间;提标左营游击马厂在今西吉县偏城乡至硝河、红庄乡一带;提标右营游击马厂在什字乡东山坡一带,其所辖小马厂在今大湾乡、开城乡至隆德县北乱池一带,提标前营游击马厂在今张易、红庄之间;提标后营游击马厂在红庄至南郊之间;提标城守游击马厂在今彭阳县古城乡至开城乡之间;各马厂牧地固定,马亦“蕃息”。

乾隆三十年(1765年),满兵拴马“5021匹”。清初规定,满兵“每名拴马二匹”,后经“将军傅良奏准,照西安、凉州例,每兵拴马一匹”。乾隆四十一年,遂将甘肃马厂地“丈勘定界,听民满垦”。乾隆四十三(1778年)年,“驻防满兵只留马2000匹”,养马业已全面衰落。清朝前期,虽禁止民间养马,但对饲养其他牲畜仍采取鼓励政策。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康熙皇帝令工部右侍郎常泰、大理寺少卿陈如咸至甘肃、宁夏,“与总督鄂海、巡抚乐拜议,教百姓牧养牛羊”。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皇帝命地方官员“多方劝导”,教百姓“孳养牲畜”。乾隆时,修“数牧”之政,畜牧业生产成为农业经营的重要内容。

六盘山地处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发展畜牧业的条件较为优越,自古以来是我国畜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土民“以耕猎为事,孳畜为生”。康熙之世,由于人口急剧增加,土地垦辟速度加快,水草丰美、适宜放牧牛、马的草地多被开垦,大家畜失去放牧条件,基本转入舍饲,而大片干旱、半干旱荒漠草原原因降水量稀少,水资源匮乏,虽不能开垦,但耐旱的禾本科、豆科、藜科植物和小灌木生长茂盛,为羊只的生长发育提供了必需的饲草来源。随着草场条件的变化,百姓在经营畜牧业时,除按使役需要舍饲一定数量的牛、驴、骆驼外,重点发展养羊,遂使牲畜种群结构发生重大调整。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养羊实践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饲养繁育经验,培育出了独特品种。

各州县俱产羊皮,成为国内著名的裘皮品种;而肉质鲜嫩的羊羊肉已是远近闻名的佳肴。雍正皇帝令川陕总督年羹尧贡羊羔美供其专用。社会需求的不断增加,提高了养羊的经济效益,刺激了百姓的养羊积极性。正如清诗所述,“边地从来爱牧羊,自然美利占丰穰。但祈山草连年茂,不羨水田百亩良”,养羊收入不亚于百亩水田所产。“平滩古寺芳村外,烟雨牛羊满暮山。”羊只饲养数量逐年增加。

清朝前期,改变畜牧业经营重点、牲畜种群结构发生调整之后,养羊成为养殖业的主体。羊只依靠放牧,在自然条件下,数量的增加取决于草场的广阔以及牧草的质量和产量。宁夏地处干旱、半干旱过渡地带,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下,植被稀疏,单位面积牧草产量不高,草场载畜量有限。清代中叶以后,由于人口持续高速增长,促使荒地开垦规模进一步扩大,垦殖指数不断提高,平原川地、塬地和低山丘陵缓坡地被全部开垦,变为农田,

水草丰茂的优质草场被垦无余,可供利用的牧地只剩下荒漠、半荒漠草原和水土流失严重的高山陡峻荒坡,畜牧业已失去赖以大力发展的基础。由于过度垦荒,使植被遭到破坏,生态环境逐渐恶化,自然灾害活动频繁,特别是周期性的旱灾,导致水竭泉涸,牧草不生,牲畜因缺乏必需的饲草而乏瘦死亡,数量大减,经营畜牧业的风险大为增加。鸦片战争以后,土地兼并加剧,封建剥削不断增加,社会日趋贫困。大多数农民因为劳作所获不足养家糊口,发展养殖业既缺少资金,又无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经营畜牧业的农户逐年减少,牲畜饲养数量日趋缩减,畜牧业生产逐渐衰落。

同治年间,长达10年之久的社会动乱,使“井邑俱荒,水涸草枯”,“人民死亡大半,牲畜掠食鲜存”。左宗棠在主持战后经济恢复时,面对“耕垦并少牛马”、牲畜奇缺的局面,在继续严禁民间养马的同时,命令所属各营将掠夺的“牛骡尽数缴出”,分给归业农民耕种。为了发挥干旱、半干旱地区“地宜牧养”的自然优势,左宗棠还从省库中借拨银两,“给发羊本”,资助“汉回以畜牧为生计”,发展养羊以尽地利。战后宁夏地多人少,耕地有余,清初开垦的相当一部分土地抛荒,自然退耕还牧,草场面积增加,牧草充裕,为发展养羊创造了条件,“乡民颇讲习之,而回族尤善经营,进款甚巨,家多余赀”。

### 民国畜牧业

六盘山区人稀,“水草丰富,夙适畜牧,近山之区概多不耕之地,居民以畜牧为生者占十之八九”。“农之家,仅畜牛、驴两三头,所以备耕作使用;兼畜羊二三十只,只一剪毛,蓄肥田之料而已,稍殷实之家,或有兼畜骡马者”。民国初年,政局动荡,人心不稳,饲养牲畜“原无专辟草场,以畜牧之各户,亦无复合资本,以务蓄息之顾而”“畜产寥寥,牧事无闻”。1920年12月16日,海原发生强烈地震,大部分地区同时受灾,压死牲畜25万多头。1927年,国民军入甘肃,供差浩繁,“徒凭一纸公文,支马派夫,一去多不复返,始而骡马空,继而牛驴少”“如此六七十年,农具、牛羊被搜刮殆尽,财产损失不计胜数。及至用种无籽,耕田无牛”“畜牧事业一蹶不振”“大好天然肥草牧地置于无用”“日趋衰落”“所饲牲畜,以羊为主,牛马等次之”。

1935年,甘肃省建设厅又拟定计划,令各县“各设一模范牧场,暂分马、牛、羊三类,选定牧地,采购良种,实施血统改良、管理改良、防疫改良等办法”。1936年,又拟定提倡奖励畜牧推进办法,创设牧场,由建设厅派员,分赴各县调查牲畜数量,对于饲养牲畜成绩显著者,予以奖励,并倡办兽医训练班,调训各县兽医,以充牧业指导,畜牧业生产开始恢复。

1941年,通过牧草种类调查,选择富含营养、生长力强、适宜栽培推广的首蓿、芨芨草、芦草、旋风草、锁木子草、狗尾草、莎草、碱蒿、马莲草、红柴和登苏等,在八里桥牧场、谢家寨牧场及张政桥农场等地栽培试验,面积150多亩。

1943年,甘肃省农林处用甘肃科学教育馆赠送的5只公羊与当地母羊进行杂交,进行品种改良试验,3年获得第一代母羊90只。1944年,与农林部宁夏农业调查团合作对口蹄疫、牛疫、牛肺疫、马鼻疽、马胸疫、腺疫、炭疽、牛出血性败血症、羊痘、豚疫等的流行情况和肝蛭、绦虫、钩虫、疥癣、羊虱、羊壁虱等寄生虫的发生规律进行初步调查。

1945年,西北兽医防治处举办兽医防治短训班,对各县土兽医、职业学校学生和农林处职员进行培训,作为防疫的骨干;西北兽医防治处组建牛瘟防治队,对境内耕牛注射山羊化牛瘟病毒疫苗,防治牛瘟的发生。同年,还兴建奶牛场,购买乳牛20余头,每日产奶80磅,供应市场。为了加快新技术的引进和推广,省政府选派优秀学生,保送到西北农学院和西北技校,学习畜牧兽医技术,还从美国聘请畜牧专家蒋森考察,推动畜牧生产的改良,近代的科学养畜、疫病防治、品种改良、饲草种植和饲养管理等技术缓慢传入,开始示范推广。

抗战期间,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后方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为畜牧业生产恢复创造了条件,地方政府发布命令,保护耕牛,严禁随便宰杀,并发放贷款,扶持无牛农户饲养牛羊,客观上调动了农民养畜的积极性。劳动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发展畜牧,增加收入,促使牲畜数量增加。

(据《多彩西吉》)

## 田州古塔

汉朝方渠,唐警州,宋定州”。又载:“明一统志,定州城在卫城(今银川城)北六十里,本唐定远城,赵元昊改为定州。田州城在卫城北六十里考方渠”。据平罗纪略载:“唐朔方城,宋威元军,夏改定州,俗呼田州。”由上可见:田州之名,早于定州,而始于唐。而田州塔,可能建于唐代中期或唐玄宗时期。因唐代是佛教盛行之时,也是建塔的盛行时,若塔建于唐代中期,距今已1200余年,真可谓“田州古塔”了。

该塔基高约3.5米,建在南北长约70米,东西宽约40米的土庙基上。庙基上面四周,砌有2米高的围墙,其南系砖花漏墙,其他是土墙。此塔系寺中一塔,寺名“皇祇寺”寺门开在座基正中,是将座基掏挖了一个深约14米,宽约2米,长约2米的直通,然后又向东西斜挖上去各约8.5米,成为两个进出口。门洞用大青砖砌成,进出口的斜道,是梯形砖阶。由此上去即进入该寺前殿内的观音阁里。其前殿约20米见方,中间东西横塑一座高约2米,长约10米,宽约1米的山,其造型是奇峰怪石,层峦叠嶂,险峻恶谷,深沟密林。山北塑一较大的观音坐像和两个女童立像,此即观音阁。山南塑有三座子孙娘娘坐像与六个女童立像,并塑有千百个山娃娃,在骑山攀树,奔驰戏耍。其小巧玲珑、神态各

异、栩栩如生,此即子孙殿。子孙殿卷蓬东悬一大钟。塔建在寺的正中,塔院后建一长8米,宽12米的佛殿,殿中塑3座佛像与6个女童立像。殿外,东西两侧各有一个宽约9米,长约13米的天井院,院北建厢房3间,南建2间。塔院东西两面,各建厢房9间,所有殿房建筑物,均与座基围墙离开约6米,故座基围墙里四周,游畅通。座基西北角设女厕,东北角设男厕。

古塔高约40米,共8层,呈6楞,顶呈锥形,系琉璃绿砌成。塔的底层,直径约7.5米,南北各开一门,中塑面向南北门扉佛像各一座,女童立像各二相陪,其他各层系空室殿,二层南北各开一门,其他各层只南面开一门。各层都设有登高木梯,塔的外形,层次分明,均系水磨青砖砌成,每层有6个窠角,并各悬一个风铃。塔的底层南北门,各殿的门,其顶均建卷蓬,边檐俱压飞檐,各拐角均压张口走兽窠角,并悬风铃,檐下统挂挂方,其方系机方、平方、花方、照面方组合而成,并配条垂和升斗鸱尾,画有山水人物,花草草木。所有殿门,均系风眼狮子雕花门、殿宇,尽为雕梁画栋。前殿墙壁,还画有二十四贤孝图。所有佛像,均雕塑描绘为锦衣玉肤。所有精雕细刻,门窗窗棂等,均经彩画油饰,金碧辉煌。

据说清康熙二十六年、四十八年,乾隆三年,曾发生大地震,塔被震损,乾隆四十八年由维新和尚重修。同治年间,马化隆造反,皇祇寺被烧,光绪十五年重修。

民国二十一年,马鸿逵在宁夏执政时,在古塔上设高等小学堂,出了不少人才。解放后,1953年学校迁至姚伏堡,迁校时将皇祇寺厢房拆走。十年动乱,古塔也遭到浩劫,所有殿宇和房屋被劫一空,塔里面所有木材建筑物全被窃走,使塔成了一个空筒。之后,塔的主体基也被挖去大部分。现在,塔的底层四周,只剩下2米多宽的土座,塔的安全,已危在旦夕了。(据《石嘴山往事》)



田州古塔。(资料图片)

田州塔,俗称姚伏塔。塔的底层门头上嵌有一块石墨,上刻“田州古塔”四个大字。此塔在平罗县姚伏公社东北方向,约有四五里路处。其塔始建年代虽无记载可考,但既名田州古塔,定与田州之名密切相连。据朔方道志载:“杜佑通典云:在黄河外俗呼田州”。又载:“新、宝二县,古置汉托获地,即